

批判与救助

——鲁迅与李光洙启蒙思想比较

宋世锋 *

引言

十九世纪后期的中韩两国几乎同时面临了来自提前进入现代的西方观念的巨大压力，僵化的政治体制以及羸弱的军事力量使这种压力最终爆发为全方位的社会危机，迅速将两个国家推入了颠沛动荡的阵痛期，其直接的后果便是整个民族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落后”。从此以后，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层面的“现代化”成了两国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长期诉求。抛开物质生产层面对西方模式的追随不言，两国在精神建构层面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始于十八世纪的“启蒙”模式也成了不二选择。西方Éclairer这个原本为“照亮，使之光明”的名词进入中韩两国后分别被译为“启蒙”和“계몽（启蒙）”。由于中韩两国现代语言的语义都是以汉字为基础，所以两者含义并无根本差异，《说文解字》中“蒙”的解释为“童蒙也，一曰不明也”，“启蒙”或者“계몽”实际就是通过教化使儿童或者处于愚昧状态的对象从懵懂或者愚昧中解放出来。而西方十八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是指当时人们对基督教信仰发生危机的时候，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新观念与新价值体系，这些新观念逐渐替代旧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的运动，从此意义而言，它是一个新旧观念斗争的过程。康德在1784年写就的短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¹⁾中指出“启蒙就是让人们走出自身所造成的未成熟状态”，或许这就是西方所谓的“启蒙”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解释。从而可见，在由西向东引入的过程中“启蒙”内涵发生了变化，“一种价值观念代替另一种价值观念”西方“启蒙”的这一重要内涵似乎被忽略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用教

* 韓國大田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科專任講師。

1)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1991年

化的手段启迪民智于蒙昧。在近现代全球思想文化交互传播过程中，某种思想或者理论内涵发生变化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其原因既有客观无意形成的，也有主观刻意而为之造成的，中韩两国引入“启蒙”思想之际，正值革命式的新旧大交替的时代，在新知识分子心目中，旧思想文化是造成国家民族极度羸弱的罪魁祸首，它已经不再具备与代表现代化的西方舶来思想文化进行比较权衡的资格，并纷纷对其采取“彻底除之而后快”的姿态。在两国以新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层的无意识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由于不属于西方话语体系范畴，所以也没有资格成为西方话语体系所界定的“价值观念”，对他们而言，深深浸染于传统文化中而难于自拔的民众是不存在“价值观念”的，这些没有“价值观念”的群体便自然而然地被想像成一群处于蒙昧未开化状态的愚民。以此为背景，东方的“启蒙”并不是一种价值观念代替另一种价值观念的价值观念之争，而是一种扫盲式的知识普及，当然这种知识就是“西方知识”。综上所述，以中韩两国为代表的东方所谓的“启蒙”，在绝大意义上当属于东方接受者基于本土具体状况刻意“误读”的结果。

一

中韩两国的近、现代“启蒙”几乎成为一个特定时代主流知识分子集体参与的一件盛事，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通过文学，具体而言是小说来进行，两国的代表人物分别当属鲁迅和李光洙了。作为中韩两国现代时期的代表知识分子，鲁、李两人都在日本间接接受了西式现代思想教育，对于满目疮痍的民族现状，前者全方位地将症结归于“吃人”的传统礼教，后者对于传统文化从根子上来了一个大扫荡，特别对儒家思想更是毫无保留地进行了批判。从本质意义上讲，两人同为东方“启蒙”主义者，即期望通过普及西式知识，利用教育的手段来拯救陷于愚昧的大众于水火之中。但两人的启蒙思想却不尽相同，本文试图以文学作品为中心，探讨一下两人的启蒙思想各自的特征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

李光洙生于1892年，卒年不明。他的创作期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末三十年左右，著有35篇长篇小说、30余篇短篇小说及系列随笔、诗歌、戏曲、时调等。

和鲁迅一样，李光洙可称得上为韩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集大成者。对于李光洙创作的分期，研究界通行以时间为线索将其分为三个时期：一、人道主义启蒙时期。此时期作品呈新出以人为中心，追求自我意识的对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反叛，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无情》（1910）、《先导者》（1910）和《开拓者》（1917）等。二、民族性改造时期。此时期的作品呈现以批判朝鲜民族的自身缺陷，并提倡以日本的模式加以改造的整体特征，此时期也是作者逐渐显露出亲日倾向的时期，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再生》（1924）、《革命家的妻子》（1930）、《爱的多角形》（1930）、《土》（1932）等。三、追求精神救赎的宗教倾向时期。此时期的作品宗教思想浓厚，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爱》（1938）、《异次顿的死》（1938）和中篇小说《无明》（1939）等。综观李光洙的以上三个创作时期，贯穿于其中的一条线索就是对于民众的启蒙，即便是到了后期将希望寄托于宗教，其本质也是为了寻求一条救赎民众之路，正如中篇小说《无明》的题目，“无明”本是佛教用语，指一种愚痴的状态，作者借此来希望人们能去除“无明”，以脱离愚昧。遁身形而上的宗教之中，只是作者在启蒙之路上屡受挫折之后的一种无奈选择。具体说来，李光洙的启蒙思想在其第二时期表现得比较清晰，在此时期，李光洙倡导的是深受俄罗斯“民粹主义”影响的“到农民中去”教农民识字、代农民写信、帮助农民以使他们迅速觉悟。李光洙的这种启蒙主义使知识分子承担了“救世主”的高尚责任，认为农民在知识分子这种“救世主”的引导下可以从种种枷锁中解放出来。另外，李光洙同时也深受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人文主义影响，因而对于农民抱有更多的怜悯与同情，从而缺乏批判性。因而李光洙的启蒙思想充满了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也注定了必定脱离现实而走向虚无。

鲁迅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从鲁迅的思想及创作发展道路来看，研究界通常以1927年为界将其创作时期分为前后两段。第一时期从1918年到1926年，在此期间鲁迅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鲁迅的大部分小说均在此时期完成，此时期鲁迅的思想以进化论和人道主义为主，也是其启蒙思想的彰显期。第二时期从1927年到1936年，在此期间鲁迅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中。在此时期，鲁迅逐

渐将自己从进化论思想中解脱出来，并呈现出颇具革命性的阶级意识，“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²⁾。鲁迅的前后两期，前期对于国民启蒙的诉求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在其时中国复杂而残酷的现实面前，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表面看来，由进化论转向阶级论的鲁迅的启蒙思想淡化了，实际上不尽然，这从后期鲁迅与彻底抛弃启蒙思想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之间的矛盾中便可窥出一斑，鲁迅的启蒙思想本质在前期与后期呈现出表不同里相同的一致性特征。从鲁迅的转变也可看出，相对李光洙而言，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则更现实化、具体化。鲁迅对于国民基本的观点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³⁾，在鲁迅的眼中，中国从上至下充满了“劣根”，所以他选择的启蒙方式是批判，通过批判来除掉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铁屋子”。鲁迅不认为知识分子是人民的“救世主”，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身也充满了问题，根本没有资格和能力去承担“救世主”的责任，知识分子能做的只是“呐喊”罢了。鲁迅采取的是斗争批判式的启蒙方式，这与李光洙的人道主义救助式的启蒙拉开了距离。下面结合两人的文学作品展开论述。

二

综观李光洙和鲁迅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者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分别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状态。李光洙笔下的主人公主要由一些提前开化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分子组成，比如表现新知识阶层恋爱婚姻的长篇小说《无情》中的知识青年李享植、金善馨以及经过转变之后也成为新女性的朴英采；表现科学救国思想的长篇小说《开拓者》中的热血青年性哉；描写知识分子启蒙农民的“归农运动”的长篇小说《土》中的知识分子许崇；同样表现青年男女恋爱婚姻的短篇小说《少年的悲哀》中的知识青年文浩等。而鲁迅笔下的主人公大部分由农民、旧文人等一些处于社会底层尚未开化的群体组成，比如《阿Q正传》中的雇农阿Q；《孔乙己》中的旧文人孔乙己；《祝福》中

2)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3)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的仆人祥林嫂；《风波》中的村民九斤老太；《故乡》中的农民闰土等。可以看出，李光洙把着力点放在了刻画以新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启蒙者身上，而鲁迅则把重点放在农民等下层被启蒙者身上，这种差异也决定了两人在启蒙观念上的不同，也引出了李光洙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以启蒙主体为中心的“救助启蒙思想”和鲁迅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以启蒙客体为中心的“批判启蒙思想”。

先从李光洙的“救助启蒙思想”说起。李光洙认为文艺是“建设新文化，并为民族注入有活力的精神的最大力量”⁴⁾，“文学依托人生、为人生、通过人生而存在”⁵⁾，他还曾经说过：“我写小说的最终动机，正如我当新闻记者、教师和一切所作所为的最终动机一样，是尽为朝鲜和朝鲜民族服务的义务”⁶⁾。由此可见，李光洙将文学作为一种工具，这种工具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启蒙，通过启蒙可以将现阶段麻木愚昧的朝鲜人民从僵化、腐朽的传统儒家思想束缚下拯救出来，重新建立以理性为基础朝鲜人新的价值观念。在李光洙观念中，启蒙又是什么呢？具体谈到李光洙的启蒙思想，必须要提到在思想上给予李光洙巨大影响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一名人道主义者，他提倡“博爱”思想，尤其是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更要怀着爱去教育感召他们，而且托尔斯泰也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庄园办起了学校，对农民的儿子进行普及教育，并担任地主与农民的和平调节人与陪审员，以期维护农民利益。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李光洙对于启蒙的观念也逐渐成型，“启蒙就是给予对方知识和训练……”⁷⁾李光洙的启蒙思想强调启蒙者对于被启蒙者的救助，其中启蒙主体是出发点，启蒙对象是终点。从出发点向终点的进行过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即启蒙主体的自我修炼、完善的启蒙第一阶段，启蒙主体在完成自身修炼之后对启蒙对象进行启蒙的启蒙第二阶段。长篇小说《无情》到《土》的过程就是一个启蒙主体自我修炼、完善后对启蒙对象进行启蒙的过程。

最初通过报纸连载方式写就的长篇小说《无情》通常被看成一部表现新知识青年男女恋爱婚姻的小说，作品通过表现三名出身、成长经历以及志向各不相同的年轻男女之间的三角恋爱故事，来反映韩国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复杂的精神面貌。其实

4) 이광수, 「文士와 修養」, 『이광수전집』 제16권, P.19

5) 이광수, 「문학에 대한 소견」, 『이광수전집』 제16권, P.179

6) 이광수, 「余의 作家的 態度」, 『이광수전집』 제16권, P.195

7) 이광수, 「朝鮮民族運動의 三基礎事業」, 『이광수전집』 제17권, P.316

我们也可以从李光洙启蒙观念角度出发，把这部小说看作一部表现李光洙启蒙思想的作品，作品描述了在留洋归来的金长老的指引下，以及国家民族凋敝的现状使整日困惑于个人欲望与情感的一系列主要人物李亨植、金善馨等最终终于觉悟，要想解决现在面临的个人与民族的问题，仅仅在当下的环境依靠现有的力量是不足以改变现状的，只有走出去去学习现代西方文明才是唯一出路的心路历程，“当几十名、几百名学子（从西方）学成归来的时候，朝鲜在一两天内便会成为一个新朝鲜”⁸⁾，向读者传递了只有西方现代文明才能拯救落后的朝鲜以及实现个人幸福这一信息，“学习西方文明是国家与个人通向幸福的钥匙”可以作为这部小说启蒙思想的要旨。而主人公们最终压制住个人欲望而面向国家民族的觉悟过程也正体现了李光洙启蒙思想中启蒙主体的自我修炼、完善的过程，小说的最后，主人公李亨植、金善馨、朴英采在经历了一系列恩恩怨怨之后，一个偶然的让他们相遇并看到了处于洪水中悲惨的难民，于是他们深受感染，共同决定为了祖国、民族的未来出国留学，进行自我完善。

长篇小说《土》则可以看作是启蒙主体自身修炼完善之后开始对启蒙对象进行启蒙、改造的作品。当然，正如前文所说，这种启蒙改造采取的是托尔斯泰式的博爱人道主义救助方式。《土》中的主人公许崇为了自己改造国民的理想，通过与尹正善的婚姻和考取日本高等文官进入社会上层，然后从都市来到农村，与农民一起生活，教农民识字，替农民写信，帮助农民脱离悲惨的处境，进而过上幸福的生活。在此过程中，许崇经历了被诬陷入狱和妻子与朋友私通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虽然有过思想斗争，但是最后他并未改变自己的初衷，仍然怀着爱的来对待诬陷、破坏者俞正根和背叛自己的妻子，他精心照顾自杀未遂而落下残疾的妻子，并把妻子的私生子当亲生儿子抚养，他认为如果连妻子和对手都宽恕不了，就无法去爱千千万万的同胞，更无法想象能够热爱祖国，他的这种高尚精神最终也感动了对手俞正根，使俞正根成为自己实现理想之路的一个合作者。在许崇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李光洙的影子，李光洙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是作者的代言人，许崇也不例外，通过许崇这个艺术形象，李光洙强调了自己倡导的农村开发计划的实施策略，即怀着伟大的爱去救助农民而使其觉醒，使觉醒的农民同样以爱来对待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便会进入理想境界。然而实践证明，李光洙充满理想色彩的这种含情脉脉温情的救助式的启蒙主义的效果是有限的，它的前景虽然看起来很美，但

8) 이광수, 「무정」, 『이광수전집』 제1권, P.193

是却远不足以唤醒其时已昏睡多年的朝鲜，他后来的宗教转向也证明了这种救助启蒙主义的无疾而终。

反观鲁迅，在文学的功用方面，鲁迅与李光洙是基本一致的。鲁迅曾说过：“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⁹⁾但鲁迅还认为“文学是战斗的”¹⁰⁾，所以他与李光洙的人道主义救助方式的启蒙思想不同，鲁迅的启蒙思想是以批判为核心的。鲁迅素以“一个都不饶恕”¹¹⁾而著称，在他的笔下，不仅仅是底层农民，还包括中上层的官僚、知识分子，只要是丑陋的东西，他一概进行无情嘲讽和严厉批判，一个都不饶恕。现实主义者鲁迅认为所谓的一些宽容、慈悲是无益的，“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¹²⁾当然，对由于身处腐朽、落后的大环境而被动养成整体主义不良性格的农民等“小人物”们，他的基本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实际上也是哀少怒多，鲁迅的彻底批判精神贯穿其一生，这也决定了鲁迅笔下很少会出现李光洙在《无情》或《土》中的先知先觉者形象，即使出现也必定会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而不会是救世主。因而鲁迅启蒙思想的出发点和终点是统一的，均为启蒙对象。究其鲁迅这种看似冷酷无情的批判启蒙思想来源，除了悲惨凋零的现实世界的刺激之外，鲁迅的彻底批判精神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反传统反偶像哲学。尼采对基督教进行强力批判，认为教堂是坟墓，鲁迅则“打倒孔家店”批判儒家思想，称中国传统文化是吃人文化。鲁迅所持的彻底批判的启蒙思想也就决定了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狂人日记》中，主人公“我”本来是一个正常人，但是在代表传统礼教权威的“大哥”、和“医生”等的眼中却成了疯子，在这种荒唐的环境下，“我”只能以一个疯子的身份才能存活，作者的笔锋直指现下的“正常人”。《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阿Q实际上不仅仅是底层农民，而是社会各层中国人的一个缩影，在他的身上，我们几乎看不到人性的一丝优点，他的身上集中了所有我们可以想象的人的精神缺点，如：精神胜利法、欺软怕硬、偷奸耍滑以及顽固守旧等。除了阿Q，作品中其他的人物像软弱可欺的吴妈、为霸

9)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10)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1页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12) 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一方的赵太爷、狗仗人势的假洋鬼子等无一不在向读者提供着同样的信息，即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群，似乎已经无可救药了。《孔乙己》中彻底撕开了以孔乙己为代表的旧时代落魄文人自命清高、迂腐不堪、自欺欺人的性格。在上述几篇作品中，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¹³⁾几乎是不留余地地对中国现行的文化和个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所以比起李光洙来，鲁迅更具备现实主义式的清醒，他无情地剥去了中国“五四”以来一些乐观主义者盲目地加在“群众”观念上的乐观想象，使之露出原本满目疮痍的真相：“群众，尤其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¹⁴⁾；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¹⁵⁾。较之李光洙的救助式启蒙，鲁迅的批判式启蒙对麻木不仁的国民或许更具备强烈的刺激效果，使他们变得清醒一些，但是国民清醒之后问题也就随之即来，也就是说，鲁迅的这种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彻底批判性启蒙思想尽管有其合理性，它可以发出最响亮的振聋发聩的呐喊来唤醒沉睡的人们，但是沉睡的人被唤醒了后该怎么做呢？这就涉及到破坏与重建的问题，鲁迅用最响亮的声音将昏睡的国民唤醒，使国民抛掉一切腐朽守旧的旧套子，旧的成功破坏之后，新的又在哪里？李光洙的理想主义式的救助启蒙思想尽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步履维艰。但它毕竟还是给出了建构一个用博爱的人道主义来维系的未来世界的构想，而鲁迅在破坏之后重建的问题上显然陷入了困境。在1925年连续写就的小说《孤独者》和《伤逝》里，鲁迅的这种困惑得到充分体现。《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是一个中学教员，作为先觉者的他每天承受这与大众距离越来越远的巨大压力，他发现自己目前的这种状态与生活的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种困惑最后导致他失业后沦为政客的顾问而后郁郁而终。《伤逝》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在新思想的感召下毅然通过自由恋爱结合在一起，但是实现自己的初步理想，即打破封建传统牢笼之后却又走上茫然之路，最终两人以悲剧收场。这种在觉醒后却无所适从显然是很多启蒙主义者遭遇的尴尬，由此进入彷徨期的鲁迅也不例外。鲁迅在1927年之后转向革命的阶级论也可以理解成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对于民众启蒙之路的另一种探索。

李光洙将文学作为一种为民众服务的手段，利用这个手段通过人道主义救助式的方式

13)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页

14)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1页

15) 同上

来启蒙民众，而鲁迅则把文学作为一种战斗的武器，利用这个武器通过现实主义批判方式来启蒙民众，在将文学作为工具以实现启民众于愚昧的目方面，两人存在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两人具体的启蒙实施方式却大相径庭，这也决定了两人作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李光洙具备启蒙思想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均为救世主似的先知先觉者，即作为启蒙主体的启蒙者，启蒙者除了具备先进的知识文化之外，还具备着高尚的道德品质，这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就是以《土》的主人公许崇为代表的一种博爱的人道主义，即人与人之间应该以非暴力和爱来相互对待，所以李光洙的小说中启蒙者自身的修炼、完善过程也是重要的部分。在启蒙者自身修炼完成的基础之上，获得启蒙资格的启蒙者对处于愚昧麻木状态中的被启蒙者进行救助，最后使被启蒙者脱离愚昧状态，过上幸福生活。而鲁迅小说中的主人公却极少见先知先觉者，这与鲁迅对于包括自身在内的知识分子持有的怀疑态度关系密切，代之先知先觉者鲁迅笔下的主人公大多为以《阿Q正传》中的阿Q为代表的处于麻木愚昧状态之中的未觉者，即作为启蒙对象的被启蒙者，被启蒙者身上集中了国民精神弱点，对于这些精神弱点，鲁迅则以毫不留情态度予以揭露、批判，其力度甚至于到了使人对于未来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程度，这与李光洙小说中理想化的光明结局形成了巨大反差。

三

源于西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现代启蒙思想进入东方后发生了变化，这在鲁迅和李光洙二人身上体现得比较充分，虽然两人像大多数的东方接受者一样，同时将启蒙定位于教化，通过上文中所示两人实行的截然不同的教化策略来看，两人对于启蒙本质的认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实际上西式启蒙的“一种价值观替代另一种价值观”含义背后，还隐含着对于横行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霸权话语权的一种批判，新价值观替代旧价值观重要的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新价值观对于处于霸权地位旧价值观的清算过程，当经过一个阶段的斗争后，新价值观代替了旧价值观而占据主流话语地位之时，对于它的霸权主义倾向又应该保持一定的清醒认识，这一系列过程可以充分体现出现代思想中通过启蒙而获

得的“理性主义”。在这一点认识方面，鲁迅较之李光洙更为深刻。在鲁迅的言行以及文学作品中，几乎看不到所谓的理想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鲁迅在对现行的社会思想状态以及价值观念进行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轻易提出一个新的理想模式与形态，他并不对任何一个代替旧观念的新观念抱有乐观主义期望，这也就充分体现了非理想主义者鲁迅对于社会运行规律的高度理性立场与姿态。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鲁迅所具备的近乎冷酷的理性主义思想杜绝了新的霸权话语同时，也堵塞了具备推动社会发展功能的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之路，正如前文所言，鲁迅是一名现实主义者，他的着眼点就是当下，“一切理论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¹⁶⁾，他否定了着眼“过去”和“未来”的“理论家”们的取向，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现在”，而且对“现在”的药方除了批判还是批判，可以说鲁迅的启蒙思想的核心便是“理性立场下的当下批判”，介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时期以来在启蒙思想领域的旗手地位所形成的巨大影响，他的这种姿态以及实践也造成了中国特别是大陆地区持续近百年的思想启蒙实践的独特风景，即以破坏为主建设为辅，直接的后果便是我们在面对破坏之后出现的真空时的茫然，实践证明由于没有及时出现合适的旧价值观念的替代品，这些真空最终还是被最初的批判对象卷土重来而填补，这也说明启蒙仅仅依靠单纯的批判与破坏是远远不够的，一次又一次的单纯批判和西绪弗斯一次又一次地推石上山又有何区别呢？批判同时进行的建设是必要的。当然鲁迅并不是圣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一个十全十美的鲁迅，正是基于此，在肯定鲁迅的以批判为核心的启蒙思想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反思其中的不足与缺憾。我们从鲁迅临终前的一句名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¹⁷⁾说起，这句话在说明鲁迅遭受了对手们的怨恨同时也隐含了鲁迅对于他们更强烈的愤恨之情。我们知道，鲁迅被称为一名战士，他的一生算得上是战斗的一生，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厦门，凡是生活过的地方都成为了他的战场，与人斗成为鲁迅一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里的人正是国人，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¹⁸⁾的姿态成为他执着于斗争的最好解释，鲁迅对中国人的判断成为他内心充满愤恨的主要原因，与“中国人”这样一个看不到摸不着但却异常庞大的对手

16)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17)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18)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

的宣战，是需要一种大愤恨的，这种大愤恨占据了鲁迅的心灵。如果从愤恨这一角度出发来理解鲁迅以批判为核心的启蒙思想，我们也就可以发现这种启蒙思想的缺憾所在了，这就是启蒙主体对于启蒙客体缺乏一种必要的关怀，鲁迅对于其笔下的人物同情心的普遍缺乏便是这一观点的最好例证。除却了关怀的启蒙势必会对启蒙对象形成全方位的批判与否定，在伤害启蒙对象的同时也反累了自己，鲁迅由呐喊走进彷徨也印证了这一点。

像鲁迅一样，李光洙的启蒙思想与达尔文的进化论颇有渊源，他接受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观点，认为现阶段属于弱者的朝鲜应该向西方以及日本等强者学习，才能成为强者。“日本成功的文化输入使其成为全亚洲的学习榜样，英、法、德、日民族皆成为世界文化思想史上的光荣民族”，而“我们朝鲜却在世界文化思想世上没有位置”，“经历了四千年历史的（朝鲜）却没有可以自豪的东西”¹⁹⁾，“朝鲜人过去没有文学艺术”，“有着四、五千年的历史，却没有象征精神文明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这样的民族当然没有精神生活”²⁰⁾，李光洙的启蒙思想的起点是建立在对朝鲜民族从根基上彻底否定的基础之上，这与当时日本为便于对朝鲜进行文化殖民而出现的社会主流观点“朝鲜是劣等民族”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李光洙的启蒙思想在起点上比鲁迅走得更远，鲁迅并没有中国属于劣等民族的言论，通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等谈论传统文化的杂文，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批评的矛头指向的是传统文化对于现下的负面影响，对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鲁迅非但没有全盘否定，而且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来整理与研究。鲁迅启蒙思想的起点是对实际存在于当下国民中间的已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民族性格的否定。在这一点上，鲁迅的选择则更为清晰、准确，避免了李光洙主观色彩浓厚的一锅端行为。李光洙的启蒙思想在起点上显得更为彻底，但同时使这种启蒙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显得困难重重，一方面由于宣判了朝鲜传统文化的死刑，使启蒙者本人只能以全盘西化的策略来对民众进行启蒙，这种带有革命性的“洗脑”在传统观念浓厚的二十世纪初的朝鲜社会是很难想象的；另一方面由于向整体传统文化宣战，范围过于庞大，同时也丧失了针对性，所以其有效性难免令人怀疑。此后的实践也证明，李光洙带有书生意气的启蒙思想起点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如果说《无情》在

19) 이광수, 「우리의 이상」, 『이광수전집』 제20권, P.155、159、160

20) 이광수, 「부활의 서광」, 『이광수전집』 제17권, P.28、29

结尾为读者留下了希望，表现的是其初期带有乐观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启蒙思想的话，那么《土》和《开拓者》所表现的悲剧性的宣扬启蒙者个体牺牲精神便是一种在现实面前的无奈之举了，正如小说中所显示的那样，启蒙者的启蒙之路是一条荆棘之路，即使通过启蒙者个体献身也很难达成目标。在现实面前的无效性也证明了李光洙所倡导的启蒙思想存在的局限。尽管如此，通过比较鲁迅的启蒙思想，我们仍然应该对李光洙启蒙思想中的闪光点加以肯定，较之鲁迅，李光洙的启蒙思想虽然深度不足，但却具备一定的体系性，既有启蒙方针又有奋斗目标。他启蒙的目的是在摒弃旧世界，通过普及新思想而建立起一个新世界，具体而言就是摒弃旧朝鲜，通过普及西方现代文明而建立起一个新朝鲜，而源于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的“博爱论”则是贯穿启蒙过程始终的一条脉络，这条脉络也说明了李光洙启蒙思想中对于启蒙对象存在着关怀情怀，而这种关怀与建设性则是鲁迅的启蒙思想所欠缺的。

结语

李光洙在对启蒙的接受以及自我实践方面，体现出了作为一名文学家所具备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人本主义关怀精神，虽然他的以救助为主导的启蒙思想在实践方面并未获得大的建树，但这也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学家。而鲁迅凭借其独特的思想深度，形成了具备高度“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在猛烈抨击“旧思想”的同时还“冷眼”理性地看待所谓“新思想”，这种批判意识强烈的启蒙思想在中国近百年的启蒙进程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表明了他不仅仅是一名优秀的文学家，而且体现了作为一名思想家的深刻性。

参考书目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一、三、四、六、八、十一、十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이광수, 『이광수전집』 제1.16.17.20권, 삼중당, 1976

北京大学等编,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邓晓芒, 〈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 《广东社会科学》, 2003第四期

김중수, 「이광수 문학론의 계몽의식 연구-초기 문학비평과 논설들에 나타난 정(情)의 문제를 중심으로」, 『한국문학이론과 비평』 제11집, 2001. 6

任明信, 「한국근대정신사 속의鲁迅」, 『중국현대문학』, 제30호, 2004. 9

이주형, 「1910년대 이광수 장편소설과 계몽의식」, 『국어교육연구』, 제34권, 2002.

12

Abstract

Criticism and Salvation

—Comparison of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 of Lu Xun and
Lee Kwangsu

Song Shifeng

As two representative states basing on Confucian culture, China and Korea have comparatively many similarities. From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and Korea gradually weakened. And this spurred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of two states to launch enlightenment movement which has approximately lasted a century. Literature was just one of thes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ctiviti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nlightenment consciousness almost simultaneously appeared in the literary field of China and Korea, an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ntellectuals were Lu Xun and Lee Kwangsu. This discourse tries to discus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 of Lu Xun and Lee Kwangsu through their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 Lu Xun, Lee Kwangsu, enlightenment thought